

1209

- 1984年第1期(总第1期)
1985年第1—2期(总第2—3期)
1986年第1—2期(总第4—5期)
1987年第1—2期(总第6—7期)
1988年第1期(总第8期)
1989年第1—2期(总第9—10期)
1990年第1—2期(总第11—12期)



黟县文史资料



安徽省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五日

目 录



- 纸船明烛照天烧.....仇迪(1)
千军万马送“瘟神”.....刘寿康(6)
为国增光的“风筝大王”胡荣宪.....蒋茂松(9)
教坛短咏.....舒松钰(17)
追和程恭甫先生南湖感怀诗原韻二首并序.....汪任安(26)
破衣谣.....吴穷君(29)

附录1—10期目录

1209

- 1984年第1期(乙卯1期)
- 1985年第1-2期(乙卯2-3期)
- 1986年第1-2期(乙卯4-5期)
- 1987年第1-2期(乙卯6-7期)
- 1988年第1期(乙卯8期)
- 1989年第1-2期(乙卯9-10期)
- 1990年第1-2期(乙卯11-12期)



黟县文史资料

第三期

(乙卯第1期)

安徽省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五日



目 录

纸船明烛照天烧.....	仇迪(1)
千军万马送“瘟神”.....	刘寿康(6)
为国增光的“风筝大王”胡荣宪.....	蒋茂松(9)
教坛短咏.....	舒松钰(17)
追和程恭甫先生南湖感怀诗原韻二首并序.....	汪任安(26)
破衣谣.....	吴穷君(29)

乙卯第1-10期目录

纸船明燭照天燒

仇 迪

“旧社会害死人，新社会救了人”，这是解放以后来自血吸虫病流行区群众内心感谢中国共产党的话。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古老的黟县，全县仅有一所三至四个人的公立医院和十几个私人诊所，分散在乡村角落。每当人民有了疾病，求医十分困难，且药费昂贵。处于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穷人一旦患病，只好小病挨过，大病等死，听天由命！岁岁月月，各种流行性疾病不断侵害人身，如乙脑、痢疾、伤寒、猩红热、流脑等十三种疾病，其中以血吸虫病危害最烈。从资料查明，在太平天国时期，宏潭乡前庄自然村，是个一百多户、三四百人的大村庄，由于血吸虫病的流行、蔓延，人口遭致死亡，到一九二三年仅仅五年时间，整个村庄只剩下十二户三十多人，至解放前夕幸存者仅五户七人，程桂枝全家十人，因患血吸虫病而死者达七人。几个老人含泪回忆当年情景说：“前庄、前庄，泪水汪汪，女儿胀肚，男人死光，十舍九空，田地抛荒……”。由此可见，血吸虫病对我县人民的为害，十分严重。

建国后，我县根据毛主席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县委、县人民政府为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县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组织医护人员奔赴流行区，发动群众，下最大决心，以最大努力，要求坚决彻底消灭血吸虫病。战斗部署分为三个步

骤，第一步组织医务人员下乡调查，全面摸清血吸虫病的流行范围；第二步查明城乡（主要是农村）的病员多少和分布情况，以及钉螺孳生蔓延的区域面积；第三步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地开展预防、治疗等有效办法。

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人们也常懂得“耳闻为虚，眼见是实”的道理。通过深入地全面调查的大量工作，结果发现柯村、宏潭、碧山、渔亭四个乡八个村四十一个生产队（自然村）的广大范围，血吸虫病流行感染最为严重。全县病员共有一千〇九人，钉螺分布面积有 $754,651$ 平方米。其中，宏潭乡的宏潭、杨林两个村的十二个生产队（自然村），血吸虫病的为患尤其严重，死亡率也高。这两个村的病员总数占全县的 30% 还多。而钉螺面积在碧山乡这个居于全县中心位置的乡村，它的分布面积高达三十万平方米以上，占全县分布面积的 40% ；宏潭乡和渔亭乡也各占分布面积的五分之一以上。宏潭乡患血吸虫病的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 71.17% ，全县的血吸虫病晚期患者有三十多人。有些疫区“瘟神”的为害尤烈，造成家破人亡，田围荒芜的悲惨现象，冷冷落落，忧忧惶惶，确乎是“华陀无奈小虫何”，“万户萧疏鬼唱歌”，令人十分痛心。

中国共产党最关心群众疾苦，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下决心排除万难，消灭血吸虫病，保证劳动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刚刚得到恢复与发展的条件下，县委则从 1953 年开始，摸清疫区情形，采取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的防治措施，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防治战斗。

第一阶段，则为调查与防治阶段。用三、五年时间，深入查清疫情与查清钉螺，确定防治重点。首先，在疫区加强粪便和水源管理，以控制血吸虫卵的蔓延孳生。同时，改建厕所、粪池，采用“三缸制”，轮流封存使用粪便的办法，以后，实行“四定”（定员、定质、定量、定时）办法，粪便由生产队集中管理。分期使用。进一步又在疫区建造三格式无害化粪池，分段使用河（溪）水，因地制宜筑造水流沙滤坝，饮用沙滤的引水，有条件的地方，群众饮用水逐步改为灶边井、竹管井、钢管井等办法，全县共新建水井85口，为查螺、灭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1956年召开全县第一次血防会议，组织十二个工作组，派到流行区和各个乡镇，发动群众共22639人（次），进行全面普查，直到1957年，共查沟160条，水塘20口，水田766亩，旱地21处，荒地9块，河滩、田塝各一处，测定钉螺面积75万多平方米，它占历史上钉螺累计面积99.69%，其密度最高的1278只／平方尺，平均也有37.4只。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血防工作的紧迫性、必要性，也充分说明在县委领导重视下，做了巨量细致深入而又非常得力和科学的努力工作，最后确定宏潭、渔亭、碧山、柯村的四乡八村是疫情流行区的重点。县委为了进一步加强血防工作领导，由县委副书记何进福、副县长常从周、农工部长吴广等参加成立血防领导小组，由县卫生局局长包兴才（注）兼血防办公室主任，并亲临第一线，在碧山乡设立血防指挥部。1958年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火红岁月里，领导带头上阵，采取领导、技术人员、群众三结合的方法，轰轰烈烈而又扎实实地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对准血防的重点目标，展开了一场“送瘟神”的

人民战争，大兴水利，开新渠，挖新沟，水（田）改旱（地），填旧圳（坑、沟），埋钉螺，管粪便，管水源，查病治病灭病，不怕疲劳艰难，连续奋力作战，直到1965年，通过综合查实，全县99.95%的螺区消灭了钉螺，基本控制疫情，赢得初战（第一阶段）告捷的胜利。当年，省血防考察团到我县进行检查考核，认为是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县之一。

第二阶段。则为巩固成果阶段。因为“文化大革命”那场劫难的影响。一度放松了血防工作领导。后来，1970年至1973年，全县开展第一次螺情、病情大普查，继续用“三结合”的工作方法，发动群众5546人次。查螺面积1365.262平方米，未发现新螺点。血防专业人员深入流行区，采取皮试、体检、环境卫生、粪检虫卵等“过筛式”的有效办法，查螺、查病、治病。查病人数40,590人，发现病员300人，即及时给以科学的有效治疗；得到不同程度的疗效，病员恢复健康。1974年发现两处约70平方米的地段有残余钉螺，立即予以全部消灭，1975年再查就未发现钉螺了。接着又于1975至1976年，组织51名医务工作者，发动群众用4086个劳动日，进行第二次全县大普查，检查面积450,465平方米，未见一只钉螺。查病人数48,408人，仅有292人没有全愈。县委再次决定，限期消灭血吸虫病。为了方便农村患者，采取分片包干，就地设点，集中治疗284人，并继续加强粪便、水源管理，新建无害化的厕所24座，三格式粪池13个，修建水井64口，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保证彻底根治血吸虫病。

第三阶段，则转为疫情监测阶段。省和地区先后于1966

年、1978年、1980年四次派出检查组，对我县的宏潭、渔亭（团结）、碧山（碧东）、柯村（宝溪）四个流行村，重点深入调查核实，共查螺面积77,646平方米，查病4,290人，历年已治病人复查258人，结果均未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同时，还对粪便三送六孵检查，对牛犢、野鼠也进行必要的细致检查，都未发现病牛和虫卵。为了对工作负责到底，再次反复检查，各种反映结果，令人满意。总之，到1981年止，县里先后对41个流行疫区的生产队（自然村）粪检25次，综合性全面查病3次，受检总人数143,132人次，五岁以上人口受检率95.43%，非疫区乡、镇、村的十五岁以上人口受检的37,481人。1983年“6.21”大洪水暴发过后，县里又专门组织调查，没有发现新螺区。因此，地区考核团鉴定，我县已经多次检查，均未发现钉螺、病员、病畜，切断了传播，根除了隐患，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要求。1984年9月21日，省血吸虫病技术鉴定组长杨兆苇、罗英彩再次深入考核，“认定黟县已达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县了”。1985年11月16日，县委召开了黟县消灭血吸虫病庆功广播大会，中央、省、地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均亲临我县祝贺和指导工作，省委地方病防治领导组办公室负责人宣布关于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正式文件，表扬了我县血防工作的功绩。

今天，我们回顾过去三十多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黟县广大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英明指示，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精神，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发动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长期连续地大打人民

战争，战天斗地送“瘟神”，如同过去民间“送鬼祛邪”一般“纸船明烛照天烧”，昔日那种悲惨痛苦的日子一去永不复返了，迎来了吉祥如意的幸福美好的新生活，疫区的旧貌换新颜，人民体质增强了，农业生产发展了，乡乡通公路，村村电灯亮，户户保温饱，人人喜洋洋，呈现一派大好的兴旺发达的新气象。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我们大家的子孙代代永远都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

（作者系县政协委员、黟中图书馆工作。根据《黟县志·卫生志》初稿整理执笔，本刊编辑略有修改与增删）

（注）何进高、吴广、包兴才三位同志已先后病故，常从周同志现已离休，定居黟县。

千军万马送“瘟神”

——回忆碧山乡消灭钉螺的歼灭战斗

刘寿康

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威胁和损害劳动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群众称之为膨胀病、大肚子病。而钉螺是传播血吸虫病唯一的中间宿主，要根除这一病害，关键是彻底消灭钉螺。

解放后，在中共黟县县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调查组，通过调查，确定宏潭、渔亭、柯村、碧山四乡为血吸虫病流行区。碧山乡是在一九五六年发现钉螺的，是我县最后发现的严重流行乡。钉

螺面积达三十万平方米，占全县有螺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分布环境复杂，乱坟荒地占三分之一，钉螺密度高达每平方市尺413只。其他三个流行乡通过水田改旱地等防治措施，控制了钉螺的蔓延。为了加速我县早日消灭血吸虫病，县委、县政府在一九五八年春，组成血防五人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何进福同志亲自挂帅，主持召开了“碧山乡灭螺歼灭战”动员大会，要求碧山、和平、西武三个乡、一个城关镇在不影响当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每天抽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劳力（约三千人），投入灭螺战斗，并提出“苦战五昼夜，基本消灭钉螺”的号召。接着，县委决定，将血防办公室迁至碧山办公，成立了工地灭螺指挥部。由县卫生局长兼血防办公室主任包兴才同志担任指挥长，成员由各乡镇领队同志担任。指挥部下设秘书、技术指导、总务三个股。记得当时有汪松泉、查惠娟、史荫良、梁佛成、汪松林、王同荪、汪文照、陈祖荫、李章华、卢时贵、吴荣春和我等一般人都分别担任了各股的具体指导工作。

这一灭螺战斗是按预定的计划进行的。第一步，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人工灭螺，通过开新沟、填老沟、剗草皮，将水田改成旱地，使钉螺没有孳生场所；第二步，采用药物喷杀，消灭残存钉螺，巩固成果。

在各乡镇做好宣传动员与劳力安排等充分准备以后，为了打好碧山人工灭螺歼灭战，县委副书记何进福，县委副书记曹全惠又亲自到碧山，召开指挥部全体人员会议，进行战前布置，明确各股任务。根据灭螺计划任务分配到各乡镇，并立牌标明，由领队负责人亲临现场，接受任务。同时做好后勤服务，搭好工棚，供应茶水，安排好食宿等。

四月三日凌晨，东方一亮，城关镇、和平乡、西武乡广大干部群众二千二百九十四名灭螺大军，肩挑着粪箕、锄头、行李和汽灯，从四面八方向灭螺工地进发，到达工地后，各自接受任务，立即投入紧张的挖土、挑土、劈草皮，开沟等工程。在各个工地里，不时播送了“中共黟县县委血防五人小组给参加灭螺人员的一封信”，激发了灭螺大军的干劲，各工地纷纷送来挑、应战书，表示“头可断，血可流，钉螺不灭誓不休”的决心，互相展开了竞赛，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负责技术指导的几位同志奔走在灭螺工地上，进行技术示范辅导，做出样子，务必防止钉螺搬家，又不断巡回检查，保证灭螺质量；负责后勤的同志也满腔热情地往各个工段挑水送茶，使整个灭螺工地呈现“铁臂摇、银锄落”，千军万马送“瘟神”的热烈场面。

经过四月三日、四日、七日三天战斗，共出勤一万三千零一十四人次上阵，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开沟十条，长五千六百一十一米；填塘四口，填沟五万零九百六十九平方米，填荒洼地四块，劈草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二平方米，清理面积三万四千九百八十六平方米。通过三昼夜战斗，提前完成了县委提出的消灭钉螺的任务。

人工灭螺后，血防专业干部卢时贵同志带领部份干部和群众用亚氯酸钙药物进行喷杀灭螺，特别是环境复杂地段，加重药物喷杀，又逢当年大旱，加速了钉螺的死亡。当年抽查，消灭有螺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四七，为我县实现消灭血吸虫病奠定了基础。以后经过不断防治、抽查检验，终于在一九七〇年彻底送走了“瘟神。”现在，人们如到碧山乡去，在接近碧东村的公路交叉地方，

可以看到一座高矗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纪念碑，那就是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丰碑！

（作者：原县政协三届常委、现任县卫生局副局长）

为国增光的“风筝大王”胡荣宪

蒋 茂 松

人们或许记得中、法两国合拍的以歌颂和平与友谊为主题的彩色故事风光影片《风筝》，也一定看过电视传播我国体委多次在山东省潍坊市举办国际风筝比赛的盛况，展现了那么多工艺精湛，造型优美、形态各异、维妙维肖、艺术价值很高的风筝，在风和日丽的碧空中迎风飞翔，婀娜多姿，那五彩缤纷的诗情画意，使人心旷神怡，啧啧称赞。它不仅弘扬祖国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而且是人们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增强体魄，交流感情与技艺的民间优良传统，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群众基础。现在，恐怕我们古黟的许多人还不了解，就在国际风筝比赛和武汉等地的风筝竞技表演活动中，有位被国内外的爱好者称之为“风筝大王”的佼佼者，多次得奖，夺得桂冠，风筝远飞重洋，为祖国增添光彩，他，就是我县旅居武汉市的老乡胡荣宪。

提起胡荣宪，故乡认识他的人不甚多了。原来，他的老家住在黟城郭门街杏墩里胡家弄，原在武汉市总工会工作，退休以后，应聘担任武汉市二轻系统教育中心会计师。他的父亲胡敬庵（元吉）

先生，是我县遐迩闻名的宿儒，漠视仕途，不事权贵，乐于杏林育才，潜心研究孔学，终生酷爱文史，广交文人墨客，创立了“杏墩家塾”和“淋沥诗社”，著述相当多，主要有：《周易程传纂注》20卷、《吴康斋年谱》两卷、《曲礼会通》、《杏墩文集》、《万山烟雨楼诗集》、《杏墩札记》、《商学偶存》、《抑斋记文》等，（可惜散佚各地，家乡所见极杳），民国时期参与编纂了《黟县志》，文学遗产是很丰富的。胡荣宪就生长在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书香门第。他兄弟四人，排行老四，也是其父晚年最爱的“末脚子”。六岁随父入塾，及至少年时，敬庵先生年迈体衰停馆以后，则转入其父门生胡金鏞开办的求实小学读书，未几年，父故，家贫，不得不弃学求商，年仅十三、四岁就“往外一丢”了，孑身一人，背乡离井，默默地在人生道路上拼搏！

著名文豪高尔基说过：“社会就是我的大学”。胡荣宪读书虽不多，但他意志坚强，性格内向，从小就表现出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善于思考，从不恃势凌弱，也不贪图安逸，爱什么就专什么，想学什么就一定要学好，有股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倔劲，这给当年的同窗好友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证明，他今天的进步和成功，完全是靠自己勤奋努力，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的广阔道路。

毫无疑问，胡荣宪在风筝技艺方面赢得的荣誉，有他的天赋功能，有他主观能动作用，也有他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和有利条件。他自幼就喜爱风筝活动，学堂放学或是在假期里，人们常见他在观音堂（八角亭）附近的纸扎店里看师傅们扎制风筝和其它工艺品，有时一蹲就是大半天，几乎着迷到茶饭都不想吃了。他的四叔胡元良本来就是扎制风筝的好手，对荣宪的吸引力更大。元良能书善

画，精于金石工艺，业余时扎的蝴蝶、燕子、老鹰，形象逼真，放上天去如同活的一样。有次，一只“老鹰”放上天，竟把地上的小鸡吓得“吱吱唧唧”地叫得乱飞乱跑。聪明的荣宪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默默地仿效他叔叔的技能。正因为他心地灵犀，执着追求，深得叔叔器重，就把如何扎鳶的技艺诀窍无保留地传给这个喜爱的侄子。

黟县历来是风筝之乡。人们过去惯称风筝叫鳶，或称纸鳶、纸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墨子与公输子是都鳶的创始人。公输子（即鲁班）制的“木鳶”，在天上飞了三天，吃住“天顶风”竟至收不下来。到了汉代，蔡伦发明了纸，而后就出现了纸鳶。五代时，有人在鳶头鳶翅上安装轻巧玲珑的竹笛，纸鳶扶摇直上蓝天时，风吹笛响，天空里发出“铃铃铃”、“呜呜呜”的悦耳动听的筝般鸣响，因之纸鳶又称为风筝。黟县的历史悠久，人们放风筝的历史也很漫长。过去，小小山城的街上，郭门、八角亭、北街口、鼓楼洞、汪家门楼、街心头、周王阁、北门桥等处，每逢“清明”前后，到处都摆设有五花八门的风筝出售，色彩斑烂、琳琅满目。还有不少爱好者如胡元良、王贵甲扎制的风筝工艺格外精致美观。城区周围的小东门、大东门、北门溪滩、县学山、城隍山、莲花芯、碧阳书院以及十二个都份大村庄的空旷场地，都可以看到大人、儿童们放鳶，相互争奇斗艳，赛比高低。风筝的种类相当多，普通的有“飞棋”、“八卦”、“门程”、“八角”，高级的有“刘海”、“罗汉”、“蜈蚣”、“金鱼”、“蝴蝶”、“燕子”、“老鹰”等等。扎制的工艺技巧非常讲究，它从竹篾选材开始，则对于如何破篾、削篾、纸绵、用纸、形象设计和彩绘颜料，

甚至浆糊要用什么配料调制，统统做到细心安排，确实要有一套真根底，下番苦工夫，可以说风筝是一项集中工艺、美术、书法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品。至于放鸕能否放得高、放得远、放得稳定，关键是看鸕的天平线部位安得准不准，是否保持平衡，是否偏轻偏重？此外，还要善于掌握放鸕技巧，观察气象和风向风力的变化，不然就放不好风筝。

放风筝之前，先得检查用线的质量和长度，线的中间有无疙瘩结。绕线的工具有用竹木棍绕的，有用自动旋转的小风车绕的。经济富裕人家的爱好者，喜欢讲气魄，摆阔气，放鸕时不但前呼后拥，有人保镖似的，他们多数喜爱放“蝴蝶”、“燕子”、“蜻蜓”、“螃蟹”，也有少数人喜爱放大型的“蜈蚣”、“皮纸鸢王”（即用特制的竹篾扎鸢架，糊上最牢固的进口牛皮纸，大小相当两三米左右），他们的风筝线是特地雇人用苧麻搓成粗细均匀得象粗鞋绳一样，很长很长，有条不紊地顺序以专用的篾篓、篾箩装着，或用特制的木轱辘绕着，放鸢时还用几个人服侍，在身边抬鸢、拉线、拢鸢和着力放线收线。大风筝放在天上，吃住了“天顶风”，有时往往难以收下来，就把线架或风车牢牢绑在地桩和树桩上。如果到了夜里，有的人还用事前精制的“小鹰隼”、“小红绿灯笼”，挂上一串长爆竹，点燃灯笼里的蜡烛，套在绷紧的风筝线上，用一支点燃的线香与爆竹药线扎在一起，打开巧妙的活门，放手让“鹰隼”、“灯笼”顺着风筝线，靠风力推动而迅速上升，这时的夜空，人们看到“鹰隼”、“灯笼”的烛光，随风摇曳摆动，到一定时间，线香引燃爆竹的药线，天空上“噼噼啪啪”的爆竹响声和闪闪发光，煞是动听好看，使聚集观看的人群由衷地拍手称

快。等到爆竹响完，灯光熄灭，“鹰隼”、“灯笼”的下部重量减轻了，它就自然地沿线下滑到地面，如果还要“赶”（黟县人叫这玩艺是“赶鹰隼”），还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再“赶”。假使说不想把风筝收下来，让它放在天上三天三夜，放风筝的迷恋者，就席地搭棚，一边看守，一边下棋、联诗、哼唱、饮酒、吃夜宵。这些成为古黟人们欢度春光美景的高尚情趣，借此给人们带来欢乐、幻想和希望！所以说，胡荣宪的天赋好，能够继承与发扬古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能够在风筝工艺上开拓创新，成绩斐然，他口口声声地说过，他永远不会忘怀父叔辈的教养熏陶，不会忘怀古老故乡母亲怀抱里的温暖，更不会淡忘祖国大地母亲乳汁哺育他成长的甘甜！

黟县民谚说的好：“深山穷家出贵子”，“有志者，事竟成”。胡荣宪的家景清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他就先后到景德镇、武汉去从商维生，但他爱好风筝的心愿和钻劲，却与日俱增，从未懈怠。日常八小时以外的业余生活，总是潜心钻研，思考如何提高风筝的工艺水平，技艺日臻娴熟。他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可却甘愿付出每月工资三分之一的代价去购置扎制风筝的材料和参阅资料，经常为了制作一只风筝而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一心扑在风筝技艺的构思上，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的确是功夫不负“如痴如醉”的有心人，那风筝工艺之神，终于使他得到了美好的报答。现在，他已是武汉市风筝协会的常委，经常参加全国和武汉市的风筝表演赛和展览活动。

1985年6月，武汉市政府邀请他参加重建黄鹤楼的落成典礼，盛情地请他作一次有意义的风筝表演。为了不负党政领导的厚

望和人民群众的美好情意，年逾花甲的他，接受邀请以后，不顾辛劳，日夜构思，反复设计，克服困难，精心创作了寓意深长而构思奇特的“黄鹤”风筝，当庆祝大典那天，他纵情放飞一群群“黄鹤”，在蓝天白云中冉冉升腾，翩翩飞舞，象征着千年黄鹤今天在娇阳和风的大好时光里又飞回来了，造成一种吉祥如意的气氛，为万里长江第一楼增添了喜庆风采，展示了祖国文化艺术传统的强大魅力，成千成万的人群无不欢欣鼓舞，会心地洋溢一种民族自豪精神。同年，胡荣宪应邀去山东潍坊市参加第三届国际风筝会和第一届全国风筝邀请赛，带去五只风筝，在工艺评比中（扎糊、造型、彩绘）得分最高。新华社、《人民画报》社记者闻名采访了他。他带去的风筝有形象风筝、人物风筝、微型风筝三种，特点是：制作精巧，造型逼真，彩绘鲜艳，放飞高稳，保持传统风格而又大胆创新。比如：制作三米多高的“白云黄鹤”和“金凤凰”，在彩绘方面就有新的突破，采用多色勾线法，使风筝色彩显得更加绚丽夺目。他制作的“阿童木”与“聪明的一休”，在放飞表演时，引起日本友人和青少年的极大兴趣，许多观众要与“一休哥”合影留念。日本代表队还把“一休”风筝借去录像，日本友人山野正子回国以后给他来信说：“您的‘阿童木’风筝最好，将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回忆”！他制作微型风筝《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只有三、四寸小，放在手心上，真象孙大圣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筋斗一样。还有如同真蝴蝶大小的“蝴蝶”风筝，飞起来时，上下扑动确实是活的一般，看了无不叫人拍手叫绝，因而享有名不虚传的“风筝大王”的美誉。

1986年，国家体委把风筝列入体育比赛项目的消息传到武

汉后，胡荣宪焕发青春的活力，充满松柏苍劲的精神，信心百倍地贡献余热余辉，投入风筝竞赛的热潮。1987年3月，武汉风筝队首次参加了第四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暨第三届全国风筝邀请赛，对胡荣宪这个风筝迷来说，既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又是一次学习交流的良好机遇。同年，他的“金凤凰”、“金龙”风筝，在湖北省武汉市民间美术展览会上，荣获了优秀作品奖。在省、市第三届艺代会上，又获得市政府授予“优秀工艺美术专业人员”的光荣称号，他是获得这项殊荣的唯一的工艺美术家。同时，国家文化部和省文化厅挑选了他的“蝴蝶”、“老鹰”以及微型的《水浒》人物风筝，被送到意大利去展出，风靡了世界著名美术家、自然科学家、雕塑家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故乡，外国朋友为之赞叹，为之倾倒：1989年，胡荣宪的风筝又飞到西班牙去展览，同样获得普遍而热烈的赞扬。

武汉市的美术馆，是我国被人们誉为“风筝的殿堂”和“风筝的世界”的美术宝库。那里陈列着一等獎的获得者胡荣宪的70多只形态各异的风筝，有长达30多米的“金龙”，色彩绚丽的“金凤凰”，造型奇特的“白云黄鹤”，憨态可掬的“七品官”，双翅欲飞的“鹰”、“燕”、“蝴蝶”，张螯舞爪的“螃蟹”，…这许多饶有情趣、栩栩如生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艺术作品，把人带进一个奇妙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所有这些，不知凝聚了他多少心血和精力。1989年2月，武汉市美术馆举办了“胡荣宪风筝艺术展”，接着又在该市的金茂大楼展览，受到国际友人和港澳台同胞的高度评价。三月，武汉市风筝协会选拔组成武汉鹦鹉风筝代表队，先后去参加南通、潍坊、北京的风筝比赛，带回了十项名次